

中国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199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國比較文學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贾植芳

副主编 廖鸿钧 谢天振

编 委 (姓氏笔画为序)

孙景尧 乐黛云 季羨林 陈思和 陈秋峰
贾植芳 倪蕊琴 曹顺庆 谢天振 廖鸿钧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委员会顾问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佐良 叶水夫 朱维之 杨宪益 杨 绛 李赋宁
林秀清 周珏良 施蛰存 赵瑞蕻 夏钦翰 黄 源
彭定安 谢挺飞

英语翻译 王宏图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 号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邮政编码 200083 **电话号码** 5425300×50

中国比较文学

1993年第1期

(总第16期)

-
- | | | |
|----|------------------------------------|-----|
| 1 | 中国比较文学前景展望(笔谈) | |
| 4 | 中西诗学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乐黛云 |
| 12 | 90年代比较文学的超学科走向 | 王宁 |
| 17 | 文学潜能的发挥——关于文学与艺术比较研究的一点建议 | 陈惇 |
| 21 | 还可再深入些与再文学性些——关于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 孙景尧 |
| 27 | 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 | 叶舒宪 |
| 35 |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点想法 | 陈思和 |
| 43 | 留学生文学现象的跨文化意义 | 程麻 |
| 51 | 漫谈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 王家湘 |
| 56 | 翻译: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 谢天振 |
-

福建学会年会论文选粹

- | | | |
|----|-------------------|-----|
| 65 | 困顿与张扬:永恒主题之于中西文学 | 徐学 |
| 80 | 对现代主义的拒绝:林语堂的文化选择 | 陈旋波 |
-
- | | | |
|-----|------------------------|-----|
| 93 | 黑格尔的悲剧“和解”论和中国的悲剧“大团圆” | 朱希祥 |
| 109 | 关于中希神话内合理因素的思考 | 陶嘉炜 |
| 122 | 感觉——幻觉模式:中澳当代小说比较 | 叶胜年 |
| 135 | 走向世界 回归东方 | 孟昭毅 |

神话原型研究

149 孝与鞋——中国文学中的俄狄浦斯主题

叶舒宪

国外比较文学研究

167 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

胡戈·狄泽林克 著

方维规 译

181 与谢芜村诗画中的“桃源境”

芳贺彻 著

王 岩 译

人 物 志

201 彼也尔·布吕奈尔——

一个继往开来的法国比较文学家

孟 华

比较文学教学

206 运用比较文学方法 提高美国文学教学质量

陈士龙

资料与书评

217 经纬并举立足全球——神话逻辑与幻想的秩序——在东西方文学的交汇中——比较研究的新视野——富有特色的新著

238 1991年比较文学书目辑录(下)

智 圆

251 英文目录

254 编 后

中国比较文学

前景展望

(笔 谈)

Prospects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This set of articles presenting themselves before reader's eyes shows our scholar's consideration to how deep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present day, in Prof. Yue Daiyun's opinion, it's necessary to have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es of the chief distinct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 discourse, her article makes a valuable investigation on whether it's possible to find a kind of discourse which both sides can accept and interpret each other, whether there are common topic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The article of Prof. Wang Ning can be regarded as a supplement to that of Prof. Yue: While highlighting a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it expounds in detail the problems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s the vulnerable spot in domestic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Prof. Chen Dun proposes that our attention should turn to the internal side from the external, overall comparative studies, to see **how** art becomes a catalytic agent which fully brings out latent potentialities of literature. Prof. Sun Jingyao's analys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ity and Manichaeism, especially the analysis of Taoism as the bridge of collis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not only are full of wit and humour, but also provides new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Literary anthropologic study is the topic which progenito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d undertaken in the thirties. Mr. Ye Shuxian discusses the conflict between global perspective advocated b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onfining textual research. In Ye's opinion, if this conflict is not reconciled, it's impossible to renovat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o fuse Chinese and Western trends of the times.

By commenting upon the "global factors" in the twenty-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f. Chen Sihe has every reason to disagree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confines the programme of "Lite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to the framework of influence study. In his opinion,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this programme, that is, both the trend of thought and the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articles of Prof. Cheng Ma

and Prof. Wang Jiaxiang also display new research levels in the fiel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the former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turned student literature and the 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cultural meaning; the latter leads reader's eyes to oversea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in local tongue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rincipal culture and nonprincipal culture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Western society.

Why so far has domestic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achieved little on translation? The article of Prof. Xie Tianzhen gives a minute analysis of the reason, and provides several promising approaches: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words and phrases in transcultural exchange, deviations i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cultural images,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etc.

How to deep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that's the problem whi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prospec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Therefore, we hope with great zeal that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wh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offer their opinions respectively on this topic. If so, the prosper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can be expected soon.

editors

中西诗学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乐黛云

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性文化转型时期。所谓转型时期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原有的主流文化(如欧洲中心论)遭到否定和怀疑,现存的文化规范和界限被打乱,过去被排斥、被驱逐到边缘的将向中心移动,过去被压抑、被禁锢的能量将释放出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而出现急速的重组与更新。

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纵向的聚合而以横向开拓、文化外求为特征。开拓和外求的方向大体有三: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如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对希腊文化的借助,魏晋时期中国对印度和西域文化的吸收;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体系内部原来被压抑和排斥的亚文化、反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凡有更新必得益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中国的词、曲、戏剧、白话小说发展为独立文体,都依靠了对俗文学的吸收;第三是外求于他种学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进化论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刷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是因为:第一,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作为20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寡头经济已被当前的多元经济所代替;作为帝国主义分割世界势力范围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而代之以独立的亚、非、拉美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构成了从未有过的第三世界。第二,这些事实上的巨大变化引起了思想观念的极大改观。人们认识到一切体系和中心都是

相对的，都只是一种人为的设想，都只是从无限的宇宙、无限的时间之流，按照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而截取的一小部分。要使一个体系富有活力，就必须在另一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他者的”陌生眼光来加以重新审视。这就促成了文化外求和横向开拓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过去，西方总是以自己为核心来理解他种文化，并把西方走向现代的经验普遍化为各种社会、各种文化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他们很少了解，也不重视别的民族对自己的看法，也就很少有机会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来认识自己，以至往往被囚禁于自己的文化囚笼之中而不自觉。上述稳定体系和中心化主体的消解，使他们感到必须在一个“他者”的参照下来重新发现自己，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就是东方文化。这就是近来西方对亚、非文化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过去东方存在于殖民体系的掠夺之中。西方世界以其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通过文化霸权方式对东方加以统治、重建和支配；正是在这种文化霸权中，东方被作为“非我”而被命名和界定，一旦殖民体系瓦解，原殖民地文化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重新找回自己，分辨并摆脱那些在自身文化发展中被歪曲、被强加的因素，确定本土文化的地位（在当代观念的诠释中），从边缘向中心移动，并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力求为世界的其他部分所接受。这就必须以原来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世界文化为参照系，重新认识自己，得以发展和更新。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在东西文化必然交汇发展的情境下来谈中西诗学对话的。对话就是“对谈”。海德格曾说：“让我们试看看何谓‘对谈’？简言之，是与某人谈及某事的一个动作，于是，谈话同时会导致一种‘拉拢得近些的作用’”。^①又说：“对谈，与由对谈导致的联结，支持着我们的存在”。^②中西

诗学对话，就是中国和西方谈及诗学的一个动作，这种会谈会使中国和西方诗学更加相互接近，导致中西诗学的联结和并存。

对话，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和能够相互解读的话语。目前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达致广泛认同的“文化话语”。从诗学来说就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一整套概念、理论和方法。第三世界文化要从边缘移向中心，要进行和发达世界的文化对话，就必须掌握这套话语。然而，如果第三世界只用这套话语所构成的模式和规格来衡量和诠释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话语的准则而被摒除在外。若果真如此，则第三世界所发出的声音仍然与发达世界是同一话语，是同一话语的独白而不是对话，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作为实例。

那么，能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呢？首先，我们不大可能找到一种“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因为文化本身并不等于亘古不变的文化“陈迹”，不是“已成之物”(Things Become)，而是在永不停息的时间之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的一切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涵义，因而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Things Becoming)，我们今天的“当代意识”本身就无法排除地溶合了大量西方的、前苏联的影响。事实上，各种文化间急剧增加的交流导致了各种文化之间越来越小的差别，而一种文化内部过去和现在的差别却迅速扩大。只要比较一下当代中国青年与西方青年的异同，再比较一下当今中国青年与其清代同龄人的异同，道理就不言自明。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纯粹的、与西方全然无关的“本土”的话语，正如

①② 海德格：《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译文见郑树森《现象学与文学批评》，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6页。

我们无法找到一个与西方完全无关的生活在汉唐时期的“纯粹”中国人一样。这样的“本土话语”即使构造出来，也不会有活力，更谈不上为别人所理解，也无法与他种文化进行沟通。

在中西诗学对话中，既不能依靠西方话语，又不能依靠本土话语，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海德格说：“交谈指证出了一个共同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共同指向一个东西，共同照明一个东西，即找出共同照耀的一个世界。具体到中西诗学对话来说，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出一些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在平等对话中进行讨论。例如“什么是文学”这一诗学核心问题，无论中、西，都曾进行过长时间探索，而又大多不外乎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作者的关系”、“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语言特征”来进行界定。

西方诗学很重视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来界定文学。所谓“世界”包括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例如说文学是客观世界的摹仿，是在大街上移动的一面镜子（现实主义），是灵魂和内在世界的总体反映（浪漫主义），是心灵扭曲和存在荒诞的揭露（现代主义），是平面化、零碎化生活的散碎摄影（后现代主义）等。另一方面，西方诗学也强调诗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体现，如雪莱所说：“诗则依据人性中若干不变方式来创造情节，这些方式也存在于创造者的心中，因为创造主之心就是一切心灵的反映。”^① 尼采则更进一步指出诗人由于表达宇宙精神之“梦境”与“狂热”，也就达到了“和宇宙本原的统一”^②。从作者方面来说，西方诗学认为文学是作者的被压抑欲望的满足，是他们为寻求灵魂的净化而采取的手段，是一种发泄或求解脱；从读者方面来说，他们认为文学本身是读者经验的产物，文学作品的语意、形式、审美潜力都要在读者无

① 雪莱：《诗的辩护》。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

限延续的阅读中重新被发现和再确认。因此，文学也是社会群体共同具有的某些观念和价值标准的体现；从语言形式来看，从希腊时代开始，亚里士多德就曾通过讨论文学语言与演说语言的不同来说明什么是文学；现代西方诗学更是认为文学就是由语言构成的一种传播模式，是表现、储存、传达美学信息的一种符号系统。这种语言经常隐含多层附加的、创新的语义，它不象一般语言只在连续的、线性的系列中呈现其意义，而是在断裂、不连续和并置中取得特殊效果；同时，这种语言结构的意义和词意又必须在与其它大量文本的参照互证中才能得以圆满实现。

中国诗学大体也是沿着以上几方面的思路来界定文学的，虽然其着重点和内容并不相同。中国传统诗学认为文学是人与世界的沟通，所谓“诗为天人之合”。外在的一切，如“天人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若与内在的人心“相值而相取”，“即成为诗”^①。诗通过与“天”相通的“人”显示着宇宙的“道”，所以说：“诗者，天地之心”^②。从作者方面来说，中国诗学很早就提出诗是诗人内心情态的抒发，如说“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为诗等。所谓“诗可以怨”，“怨毒著书”等也是说明文学是作者郁积于心的不满和怨愤的发泄。从读者方面来说，中国诗论强调诗与非诗的区别就在于作品能不能对读者产生一种“感发”作用。王夫之说：“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③也就是说诗歌是否成其为诗歌就看它是否能引发读者广泛的联想以至灵魂的震动（感兴）；他还强调作品的意蕴和价值的实现与读者的接受直接有关，如说：“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④至于用语

① 王夫之：《诗广传》。

② 《七纬·诗纬》。汉代《七纬》原著已佚，引文见清人赵在翰所辑《七纬》。

③④ 王夫之：《薑斋诗话》。

言的特殊性来界定文学，中国诗学也有很长的历史。《典论·论文》最早提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强调“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等都是以语言的特殊性来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刘勰更进一步指出：历史著作往往以“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为上，而文学作品却必须“义生言外”，能显出“文外之重旨”，收“秘响旁通”之效才算上品。他还专写一章“隐秀”来讨论“情在词外”、“义生言外”等问题。这都是把文学看成一种具有特殊语言设计的艺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西诗学关于“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侧重点、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都不尽相同，但思路却大体一致，都是从作家、读者、外在世界和作品本身四个方面来加以界定。这种对于共同问题的不同侧面的探讨正是中西诗学对话的“共同世界”和出发点。其他如“言、意”——语言和意义；“载道、缘情”——理智与感情；“物、我”——主体与客体；“形、神”——形式与内容；“虚、实”——真实与虚构；“正、变”——继承与发展等等都可以作为中西诗学对话的“共同世界”。当然有些范畴并不完全对应，如中国诗学中的“神、形”与西方诗学中的形式和内容就不完全对应，但这并不妨碍比较诗学就这一范围进行不同层次的探讨。

总之，中西诗学对话的共同话题是层出不穷的，这样的对话有三个特点：

第一，对话双方都是从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并不以某一方的概念、范畴、系统来截取或强加于另一方。双方都是以对方为参照系来重新认识和整理自己的历史；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既能发现共同规律，又能发现各自文化的差异，并使这种差异为对方所利用，以至促成其新的发展，

第二，由于对话引入了时间轴，而不是并时性的平面比照，中西诗学对话就有了历史的深度。在对话中，中西诗学历史全面开放，既不受新旧观念的时间限制，也不受远隔重洋的地域环境所局限。在这种“共同世界”中，千年前的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对美国现代意象派诗歌的发展给予决定性影响，几百年形成的中国戏曲传统，也可以对20世纪以布莱希特为首的欧洲戏剧改革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这样将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所进行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辩”融为一炉，也许正是鲁迅所梦想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一条具体途径。

第三，对话本身是一个复杂概念，它包含着多层面的内容和多元化的理解。平等对话并不排斥有时以某方体系为主，对某种理论进行新的整合，也不排除异途同归，从不同文化体系出发进行新的综合性体系建构；它有时是有关重大问题的思考，有时也只是一些管窥蠡测的意见互换。对话也可能由一方提出某种设想以便展开讨论，例如上述讨论文学界定的框架就是由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他的专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一书中所提出。只要能成为一种富于启发性而双方都有话可谈的话题，由谁提出并不重要。狭隘虚假的妄自尊大或唯我中心，无论出自何方都是平等对话的大敌。

总而言之，当代诗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总结世界各民族文化长期积累的理论和经验，在各文化体系诗学，特别是中国、印度、阿拉伯、欧美四大诗学体系的平等对话中，从不同角度来逐渐解决人类在文学领域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通过这种对话，在各民族诗学交流、接近、论辩和汇合的过程中，无疑将熔铸出一批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这些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不仅将在东西融合、古今贯通的基础上，使诗学作为一门

理论科学进入真正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新阶段，而且在相互参照中，也会有助于进一步显示各民族诗学的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

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举行首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1992年12月28日至20日，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首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由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会议。南京师大校长谈凤梁教授到会祝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在会上扼要介绍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其所属十个分会的情况。她指出，21世纪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纪，其中有经济的竞争，也有文化的竞争，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发展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胡家峦会长介绍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指出中美文化的融合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深入的研究。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程爱民汇报了研究会工作，并提出一些设想：1. 每年争取召开一次年会；2. 经过2年准备，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支持与帮助下，举行一次中美学术双边交流活动或主办一次国际会议；3. 争取创办一个中美文化研究方面的刊物；4. 多方联系，为本会会员发表学术成果创造条件。最后经理事会讨论通过，93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论题为“90年代中美文学与中美文化关系”，具体时间另定。随后两天，代表们就“中西文化对话”、“中外(美)文化比较与交流”等专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程爱民)

90年代比较文学的超学科走向

王 宁

近二十多年来，比较文学的超学科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方，对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从结构主义、神话原型理论、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直到新历史主义——都不可能仅仅在文学自身的领域内予以探讨，因而有的批评家干脆将其统称为“理论”或“批评理论”，同样，任何一种文艺思潮——从现代主义、历史先锋派直到后现代主义——都或者演化成为一种涉及各艺术门类的思潮，或成为一种具有不同变体的国际性泛文化现象，因此对其考察研究就只能是跨语境的、跨文化传统的和跨学科界限的。对于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在这样一种广阔的语境下驻足自身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便成了一个紧迫的课题。这就需要对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模式予以重新定位，或者说，把重点从原先的接受——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逐步转向超学科研究。我认为，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兴未艾而超学科研究则刚刚起步的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再次强调超学科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超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比较文学研究又译为“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而且后两种译法在港台比较文学界更为流行。但在我看来，这后两种译法并未恰当地表达出这种研究方法的准确定义和丰富内涵，用翻译理论的术语来说，即仅仅达到了